

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报告

□ CEES 研究团队

武汉大学 质量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为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斯坦福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在2015—2016年开展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CEES调查采用了国际水平的随机抽样方法和质量控制措施,回收了1208家企业和11136名员工的有效问卷。

CEES第一次调查于2015年在广东开展。为体现中国迅速发展的中部区域的特征,2016年除继续在广东调查外,CEES在湖北进行调查。2016年的广东调查追踪了2015年成功调查的企业和员工样本,同时补充了一些新员工。

一、企业盈利能力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面对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需求的下降,中国制造业企业基本盈利状况如何?2015年,企业利润率(税后利润除以销售额)的均值为3.3%,中位数为2.4%,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为4.6%,中位数为2.5%;净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为8.6%,中位数为5.6%。上述指标25分位数都接近于0,而75分位数约是中位数的3倍;19.8%的企业利润率为负。

分省份对比发现,湖北企业的利润率要高于广东。分年度对比则发现,广东企业的利润率从2014年的2.3%增长至2015年的3.0%,而湖北则从2014年的4.8%下降为2015年的3.7%;两省的亏损面(亏损企业数量占比)较为相似。

利润率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差异很大。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为3.9%,远高于国有企业的2.2%和外资企业的2.1%;同时民营企业的亏损面为18%,低于国有企业的26%和外资企业的21%;非出口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利润率相似,均高于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企业(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亏损面低于非出口企业。

以上企业盈利状况的变化,所描述的是2014年和2015年都存在的企业,没有考虑退出市场的企

业。CEES抽样框依据的是2013年12月的经济普查数据,一种估计企业退出率的方法是计算经济普查时点至调查开始时点之间,抽样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假定找不到的企业都是退出市场的,2015年6月在广东的调查发现,有15.8%的企业在过去的18个月(以2013年12月为起点)退出市场;2016年7月在湖北的调查发现,有18.3%的企业在过去的31个月(以2013年12月为起点)退出市场;2016年7月在广东的调查发现,2015年调查企业中有5%已退出市场。

CEES调查了企业管理者认为的一些妨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将这些因素按妨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劳动力成本为60%,市场需求为56%,技术人才为37%,创新能力为30%,劳动力技能为30%,管理人才为29%,税收为28%,融资成本为27%,融资途径为25%,政策稳定为23%。

二、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就业

对于不同职位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员工而言,2014—2015年工资增速呈现较大差异:技能型员工的实际工资较非技能型员工有更快的增长,如技能型员工中的其他管理人员、技术或设计人员和销售人员实际工资分别增长了8.8%、7.3%和11.3%,而非技能型员工中的一线工人仅增长了6.4%。中高层管理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不明显,仅为2.4%。初中及以下员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略低于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学历员工。

不同教育水平员工的工资有何差异呢?大学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实际工资为5276元/月,较高中学学历员工(4168元/月)高27%。

不同职位员工工资又有何差异呢?数据显示,中高层管理者的工资水平最高,2015年的实际工资为5903元/月,其他依次是技术和设计人员、其他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一线工人;中高层管理者实际工资较一线工人高66%;男性员工比女性员工的实际

工资高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趋紧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员工离职率较高。对劳动力连续两年跟踪的调查数据显示,员工总体离职率为 26%;28 岁以下的员工离职率高达 37%;外地员工的离职率为 30%;外资企业的离职率为 29%,高于国有企业的 22%。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工资分布都集中在均值附近。2014 年和 2015 年的工资基尼系数分别是 0.30 和 0.29。这表明工资不均等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且略微下降。

工资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不高。虽然劳动者的工资在不断上涨,但企业工资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却相对较低,且仅有小幅的上涨。工资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均均为 17%,2015 年为 18%。

员工的社保参保率方面,76%的员工参加了社保,其中广东的社保参保率为 80%,要高于湖北的 72%;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保参保率分别为 98%和 92%,显著高于民营企业的 69%。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关系。近年来,政府鼓励工会在劳资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61%的企业设立了工会,59%的企业在决定薪酬水平时有集体协商程序,61%的工会领导是通过员工选举方式产生的。

企业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呢? 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 2013—2014 年间下降了 2.2%,2014—2015 年间下降了 6.2%;湖北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在 2014—2015 年间下降了 3.3%。2014—2015 年,广东就业下降企业占比为 52%,湖北为 45%。这些变化主要针对这两年均正常经营的企业,而不涉及新进入和退出的企业所导致的就业人数变化。

企业员工人数的下降主要集中在非技能型劳动力。一线工人的人数下降了 6.20%,其他员工下降了 2.9%;技能型劳动力则下降得更少,其中中高层管理者下降了 0.5%,其他管理人员下降了 1.4%,销售人员下降 0.7%,而技术和设计人员则略微增长了 0.6%。就业的这一结构变化表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正不断提高技能密集度。

三、产业升级与创新

虽然新增投资能够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并且有助于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但实际上近年来企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显著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投资率(投资占销售额的比重)在 2013 年为 25%,2014 年为 21%,2015 年为 19%。用投资除以上一年末固定资产总额来衡量投资率,也可发现相同的趋势。与广东相

比,湖北虽有显著更高的投资率,但年度变化也呈下降趋势。

企业使用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情况如何? 8%的企业使用了机器人,其中广东为 10%,湖北为 6%;44%的企业使用了自动化设备;自动化设备价值占设备价值总额的 17%。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均为 14%,远高于民营企业的 6%;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分别为 15%和 11%,也远高于非出口企业的 5%;行业分析发现,机器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造、金属制造等行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最高,而纺织和皮革制造行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最低。

近年来,中国政府着重强调了创新对于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性,通过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紧密结合,生产更高质量产品。创新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来实现,包括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的投入。本报告以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研发人员占总人数的比例、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比等三个指标来衡量研发投入的强度。2015 年,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为 1.8%,平均研发人员占比为 6%,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比为 45%。

2013—2014 年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和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比均增长,但 2014—2015 年这些指标停止增长,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比甚至从 54%下降到 44%。因而,研发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一样,也在下降过程中。从不同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的研发强度比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显著更高,但与 2014 年相比,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强度都有所下降。外资企业的研发强度下降幅度最大,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占比从 2014 年的 57%下降到 2015 年的 38%。一般贸易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例为 2.7%,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的 1.7%和非出口企业的 1.5%。研发支出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例为 4.3%,而非高新技术企业仅为 0.9%。

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其专利产出也更高。2012—2015 年间,按所有制类型划分,国有企业中有专利的企业占比最高,为 67%;按贸易类型划分,一般贸易企业中有专利的企业占比最高,为 59%;按是否高新技术企业划分,高新技术企业有专利的企业占比更高,为 87%。

四、企业管理与质量

CEES 调查了企业的一把手或主要决策者的一些指标。从年龄来看,76%的企业家年龄在 40~60 岁之间,在剩下的企业家中,9%在 60 岁以上,13%在 30~40 岁之间,只有 2%在 30 岁以下。

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很高,61%为大学及以上

学历,29%为高中学历,10%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企业家学历差异很大,国有企业中78%的企业家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外资企业为63%,民营企业仅为31%。有62%的企业家是企业创始人,小企业的这个比例为77%,明显高于中型企业的65%和大型企业的41%。

企业家拥有政治关系的比例较高,37%的企业家曾经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过,23%的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7%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湖北企业家的政治关系要明显强于广东,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比例是广东的2倍。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显著更强,其中,71%的企业家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过,88%是中共党员。有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也有政治关系,38%的企业家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经历,25%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39%是中共党员。外资企业的企业家的这些指标均明显低于其他组别。

民营企业的接班选择方面,18%的中高层管理者与企业家是亲友关系,26%的企业家表示很可能将企业交给下一代,47%的企业家表示可能会把企业交给下一代。

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管理效率如何?国有企业管理效率得分为0.63,高于外资企业的0.55和民营企业的0.53;一般贸易企业的管理效率得分为0.57,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的0.54;大型企业的管理效率得分为0.61,明显高于中型企业的0.54和小型企业的0.45。

管理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质量管理能力。49%的企业使用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26%的企业使用了目标管理法,11%的企业使用了QC(Quality Control)七大手法,7%的企业使用了PDCA(Plan-Do-Check-Act)循环,5%的企业使用了零缺陷管理方法,2%的企业使用了六西格玛体系。管理的改进带来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2014年企业产品的一次检验不合格率为2.2%,2015年下降到1.6%。

更高的产品质量表现为更多的新产品。新产品销售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7.7%,增长至2014年的8.3%,进一步增长至2015年的9.0%。因而,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支出下降了,但新产品销售占比却在不断增长。

五、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净出口虽然在中国GDP中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但近年来这一比重却出现了下降。一些研究认为,随着中国产业能力的提升,国内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也在提高,这一转变主要来自于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从国外供应商转向了国内供应商。

2015年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仅占13.3%。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仅占全部投入品价值的3.7%,企

业对于进口中间品的依赖性不高,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提高。企业对进口资本品的依赖则高于进口中间品,2015年使用进口设备的企业为27%,进口设备占机器总价值的比重为11%。

在进口中间品和进口设备的使用比例上,外资企业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按出口类型划分,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中间品与进口设备的使用比例最高,其次是一般贸易企业,最后是非出口企业。

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是出口企业的增加值率。一般贸易企业的这一指标为45%,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的44%;民营企业则为48%,要高于国有企业的40%和外资企业的41%。

六、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来吸引并支持企业发展,其中有一些与上级政府的政策相关,这些政策体现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积极性。52.8%的企业获得过补贴(包括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2015年,获得补贴的企业的平均补贴率为2.6%(补贴率指补贴占销售额的比重),已接近企业3.3%的平均利润率。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政府收费,在调查中没有体现。企业按政策规定的固定税率缴税,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所得税。企业获得不同类型补贴的状况是:48.9%为税收减免,24.4%为税收返还,两者相加占补贴的73.3%;技术创新补贴(包括高额技术补贴、其他创新补贴、机器人购买补贴及自动化机器购买补贴)占补贴总额的11.8%,环保和新能源补贴占4%,租地补贴占0.5%,其他财政补贴占10.4%。

国有企业获得补贴的可能性最大,获得补贴的企业占比达到了83%,远高于外资企业的50%和民营企业的49%。民营企业的补贴率是3.40%,远高于国有企业的1.7%和外资企业的0.9%;资本密集型企业获得补贴占比为62%,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的43%,这与政府加快转型升级的努力相一致。

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融资困难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47%的企业有过银行贷款;湖北有银行贷款的企业比例为59%,要远高于广东的34%;民营企业有银行贷款的比例为54%,高于国有企业的44%和外资企业的23%;资本密集型企业有银行贷款的比例为62%,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的30%;12%的企业有过民间借贷,其中民营企业为16%,外资企业为2%,国有企业则为0。

■ 《宏观质量研究》2017年第2期,原题《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报告(2015—2016)》,约33500字